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项目成果

民族关系与公共政策译丛

李俊清 主编

分离、同化或融合： 少数民族政策比较

[美]特伦斯 E 库克 主编

张红梅 译



*Seperation, Assimilation,
or Accommodation: Contrasting
Ethnic Minority Policies*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分离、同化或融合：少数民族政策比较

Seperation, Assimilation, or Accommodation:
Contrasting Ethnic Minority Policies

Terrence E. Cook [美] 特伦斯·E. 库克 主编

张红梅 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10-3430

Seperation, Assimilation, or Accommodation: Contrasting Ethnic Minority Policies

By Terrence E. Cook

©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3

First published 2003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格林伍德出版集团公司授权中国东方出版社在中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

《民族关系与公共政策译丛》

前 言

民族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文化与政治现象,几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民族传统和民族习俗深刻影响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民族心理和民族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个体的行为方式。当今世界有 3000 多个民族,民族问题是深刻影响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上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民族构成是影响国家结构形式的重要因素,而和睦的民族关系则是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中国国情,得到了各民族的衷心拥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壮大、社会结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影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改进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也需要借鉴国际经验。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对我国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组织编译了《民族关系与公共政策译丛》。“译丛”对所译著作的选择主要考虑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学科专业领域的角度,尽量选择以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视角分析民族问题的著作;二是选择近年来出版的著作,力求反映国外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三是在著作性质方面,既选择基础性理论研究著作,也选择了有关英美和亚太地区实证分析的成果。《译丛》由李

俊清教授任主编,张红梅、施巍巍、谷明任副主编。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04和05级王宏宇、贾丽莎、徐慧杰等部分研究生参与了翻译工作,12级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杨明明、宗元淇、杨卓耸参与了译校工作,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译著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加之时间和水平所限,所以我们在书目选择和翻译的准确性方面必然会存在许多问题,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李俊清

2010年10月

目 录

《民族关系与公共政策译丛》前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作为种族隔离的分离:强势民族的战略	17
第二章 作为分离主义的分离:弱势族群的战略	40
第三章 强势族群的同化控制策略	88
第四章 作为一种整合的同化——弱势民群的发展战略	122
第五章 最小化的融合:强势民群的策略	141
第六章 最大化的融合:弱势民群的策略	160
第七章 如何摆脱零和博弈:克什米尔冲突事件	190
第八章 冲突解决中的转换博弈论	209
参考文献	224

图表

1.1 少数民族政策的六个主要方向	19
5.1 弱势民族的政策选择及其可能的后果	143
5.2 政体和党派变量如何影响种族融合策略	147
6.1 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怎样达到融合	175
6.2 种族冲突中联合的跨度、领导者的中间观点、融合的尺度	189
7.1 博弈种类或者问题:按危险程度来排列	192
8.1 四种活动规则	212
8.2 进化的博弈论和转基因博弈论的对比	214
8.3 转换的博弈论,良性的方向 VS. 恶性的方向	217
8.4 第三者可以帮助高冲突的博弈转变成更易于驾驭的情况的四种方法	221

绪 论

本书是有关民族冲突的著作,通过对“民族”广泛的定义来理解种族的、宗教的、语言的、民族的、或同种族的文化类型,而并不是从等级角度来理解。根据这个定义,一个民族共有自己的名称、共同的血统观念、历史、文化特征,以及出生地。(cf. Gurr, 2000, 5; Smith, 1986, 22 - 28)虽然在本书中我着重论述民族冲突,但是这本书中的分析论述也很容易拓展到其它类型的冲突中去,例如等级冲突或性别冲突。

民族冲突远远多于其他类型的人类冲突,并在每天的新闻报道中占据显著位置,只是因为这些因素往往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能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 1990 年以来,世界性的战争很少见了,然而内战却变得很常见,尽管自 1995 年以来暴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缓。但马雅·查达(Maya Chadda)指出“自 1989 年联合国记载的 86 个冲突事件当中,只有 3 起事件与国家间的武力冲突有关,其他都是由民族和社会团体间的暴力行为引起的内战”(Chadda, 1997, x - xi)。马塔·斯宾塞(Metta Spencer)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年度观察报告:1996 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 40 场战争中,有 38 场是与敌对民族间的冲突有关的,另外两场战争中的一场是索马里地区同一民族中不同部落之间的冲突(Spencer, 1998, 18)。但是更多的暴力行为是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进行,比如民族暴乱或者个人的敌对行为。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和五角大楼一部分的恐怖性破坏事件都渗透着民族仇恨,致使 3000 多人丧生。民族对抗问题是任何有关人类暴力行为理论的中心研究内容。这些都是人为因素引起的并且潜在地取决于人类的控制。

虽然有很多关于人类侵略的推测性理论,但事实上我们对此了解得还

非常少,除了明显的证据——较热的气候以及温和的气候里最热的季节都与人类侵略非常相关,但是由于我们不能把空调安在城市大街上,所以这些原因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Green, 2001, 32 - 35)。

事实上,所有国家都存在民族多样性,很多国家都经历着民族冲突的加剧。此外,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关于少数民族的某项政策(或者有时是一套政策)。

对于既定民族政策的支持者来说,什么是他们“宣称的”正努力去做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能相信这些自我宣扬的报告,又何曾考虑过隐藏在背后的其他可能性动机?在这些宣布的和未宣布的政策背后又暗含着何种假设呢?这些政策倡导会遇到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考虑到政策实施可能会发生的反生产力的、非故意的、不想得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这些政策能够成功吗?

如果政策确实能够解决问题,那么当问题没能得到很好地控制和解决时就可能是由于政策没能得到彻底地实施。

然而,当出现下列情况时,一项政策就是被过分推进了:(1)遵循该政策本身设定的目标,但这项政策变成反生产力;(2)对实现其他有价值的目标造成无法接受的破坏。尽管有人认为应该适度地做些例外处理,但是刻意最大化任何某一目标都是疯狂的。妥协协商是不可避免,但是很难说清该怎样解决这些有价值的目标之间的紧张局面。在本书的论述过程中,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举例说明。

人类心理学角度:突发的、紧急的、隐性的

有人认为社会科学必须植根于或者严格来源于“细微观察”,是在微观层面上对人的行为进行一些简单事实陈述,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观和宏观层面上的理论。

也许这种观点意味着从很小层面上非常简单的事件可以推及至中观或者宏观层面的行为。人的心理存在一些直觉和简单的方面,例如自我保护

和性的动机,在这一点上是与人以外的其他动物相同的。也有一些相对简单的学习机制或者通过模仿改变刺激与反映之间关系的机制,例如经典性(巴甫洛夫 Pavlovian)条件反射机理,或者操作性(斯金纳 Skinnerian)条件反射机制。

但是有时学习的形式在预测政治行为时并不十分有帮助,认识能力的不足局限了我们更为复杂的心理活动。正像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他的助手所认为的,我们所拥有的充其量是有限的理性。思考一下我们理性的某些局限性,我们试图去做但却做不到的事情包括(1)辨别距离我们遥远的事务之间的不同之处,例如分辨一个理想状态的家庭与我们现实家庭的不同;(2)把许多事情按照优先程度排序;(3)以多个标准进行评价;(4)把很多选择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成对的或者逐次的、一个接一个的选择;(5)更加有逻辑连贯性而不是感性的、不加以识别的将某事物与其他事物愉快地联结起来,或者与相似的事物痛苦地联结在一起;(6)不以物喜不以己悲;(7)不要怀疑我们昨天未曾获得的、或者只有在遥远未来才能实现的事情;(8)认识到同样的投入可能与产出的规模、地点、时间并没有持久必然地的联系;(9)避免相信赌徒的荒谬说法,即根据一系列个别的事件就夸大可能获得的总体收益;(10)当一个特别的低风险事件在许多类似地区同时发生,或者在很多将来发生时,能够正确预见到更严重的风险;(11)避免陷入沉没成本,或者想弥补损失却损失更多;(12)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前面提到的事例。

相比之下,无限理性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受到很多关于投资者行为的虚拟景象的启发,许多经济学家为我们具体说明了一个与无限理性相关的认知框架(自我利益或者其他考虑,更多强调自我利益),无限理性的主要动机或“最大化”(通常指经济利益),还有代理人处理不确定性的一般模式(通常期望效用最大化)。虽然这种理性选择范式逐渐渗透于其他社会科学当中,例如政治学,但是我越来越怀疑这种观点,好像沉默认同,主要目的,和以不确定性为导向是能够在任何情况之前出现的简单现象。

相反,我认为在个人的认知、目的、对危险的反应中有着相当复杂的人

类心理活动,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以适应不同的状况。此外,没有任何人格化的意思,我认为代理人的处境经常决定了从心理活动潜意识中选择什么,或者能够真正地塑造心理潜意识,比如增加或者减少一些动机等等。我认为这正是接下来我所要定义的“突现特征”和“隐藏特征”的真实体现。

首先,让我们来界定一下突现特征。虽然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承认总体是由部分构成的,但是否认该观点(被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即社会行为必须简化为基本的公理和人类行为的假设(更不用说化学或者物理了),或者物质的大规模运动最终必然用亚原子理论揭示,可能以超弦理论结束。方法论个人主义没能掌握之处在于许多现象之中存在着“突现特征”,从而可以说,即使系统分析方法包含了对局部的重视,但是按比例扩大的方法揭示了仅仅观察局部(在社会学中往往是个人)是绝不能洞悉行为特征的(邦格 Bunge, 1996, 51)。他继续说,“个体的方法对社会来说不能解释整个社会系统的形成,持续或者消亡”(邦格 Bunge, 1996, 247)。因为“每一个系统拥有它的组成部分所缺少的(突现)特征”(邦格 Bunge, 1996, 251)。引用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生 K. C. 科尔(Philip Anderson, K. C. Cole)类似的观点:“宇宙所包容的万物是不能通过对一些小事物或者事物的基础部分的理解来解释清楚的。每一次你从夸克到原子到咀嚼口香糖到生命到星系来解释万物,但是新事物的出现却不能继续通过较低层次发生的一切进行解释或者预测”(科尔 Cole, 1997, 62)。对于安德生(Anderson)来说,大事物并不是小事物的简单放大,而是“有更多的不同”。物理学中正确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同理,个人行为非常不同于集体行为,一个人不可能得集体瘧病,只可能感染某种流行病”(科尔 Cole, 1997, 63)。所以突现特征认为存在于较低层面的可观察到的事件,不能预测或者解释在较高层面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与此相争论的另一种情况是有时发生在较高层次、或较大范围内的事件能够预测或者解释发生在较低层次的事件。所有科学中的创新性思维往往都包含了从假定“不变”到“可变”的转换,有时这种转换出现在发现异常事件、或者出乎意料的事件之后。粒子或亚原子物理学家始终坚信他

们正在揭开的法则是持久不变的,正如固态物理所研究的,能够最终解释在物质大规模运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但是,一些固态物理学家,当然是物理学中的少数分子,认为这种观点是可以反过来说的。见解独特的人士,例如罗伯特·劳克林(Robert Laughlin)(斯坦福 Stanford),或者大卫·派因斯(David Pines)(伊利诺伊州和洛斯阿拉莫斯 Illinois and Los Alamos)认为:不需要完美的亚原子物理学来解释宇宙中物质的总体运动,物质的总体运动能够预测或者解释发生在亚原子物理领域的事件也可能是正确的,但也许所引起的变化能够在“自然法则”中发现。¹许多异常发现来源于对太空的最新研究,因此,在我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科学家报道发现了一种新的异常密集的星群,显然是夸克以一种从前没有观察到的或没有想到的方式紧密排列的。

同理,人类个体心理层面的活动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么多的因素远远超出我们所认为的:个体心理活动受到能够束缚个人选择的大众行为模式的影响。我承认我们的生理天赋或刚性的线条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但是我怀疑我们软性的线条变化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快得多。

如果用一个专业术语来描述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反的情况,我将其称为“隐藏特征”并推测性地给出一些例证。在仅仅将“突现特征”概念引入社会科学当中时,个人心理学最多能够提供一种行为模式存在的潜在可能性,而只有当个人的规模被扩大到很多人的群体范围并相互作用时这种行为才出现。但是,也有可能是整体上的行为模式不仅能够从已经存在的人的心理活动潜意识中“选择出来”,而且实际上也可以“塑造”人的心理活动。

如果将从已有的可用的潜意识中进行选择称之为“突现特征”,那么实际的“塑造”也正是我所要强调的“隐藏特征”。

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环境的框架有时会支配我们如何在该环境中认识形成我们的选择。人类行为的总体模式,例如标准化引导和再生产(已经“制度化的”)的市场或者政治秩序,可能在现有的选择之前就已做出,并支配着一些与我们每个人相关的决定:(1)对于不确定性或我们大多数人称

之为危险的态度;(2)利益认同;(3)目标。既然如此,那么宏观和中观理论所界定的大规模人类行为模式确实能够塑造微观层面上的心理。除了一些相关的原始自发的过程,几乎很少人的心理不与之相适应。博弈理论提醒我们“环境”的较小变化可能引起我们期望的较大变化,这些期望依次能引起我们非常大的“行为”变化。所以这些理论都建议密切关注环境形势,通常是部分的模式或结构,因为这些可能引起人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化。

考虑一下“风险厌恶者或风险接受者”。首先想像一下选择模式的序列,从几乎病态的谨慎(“最小化”,这种选择好象专注于避免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到不计后果的鲁莽(“最大化”或者被已有胜利冲昏头脑而不计后果)。有人怀疑是否环境的结构设置和较紧急的情况不仅支配着来自现存潜意识的选择,同时也对目录进行删减或者添加。

环境没必要总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定义,假设一只蝙蝠落在你的脸上,你知道平均每 100 只蝙蝠中有 1 只可能传染狂犬病。而且不只是咬一口,哪怕是一点点唾液滴在人的眼球上都有可能传染狂犬病,一种致命的疾病。那么这个人会忽视其他所有选择,而作出最小化(谨小慎微)的选择——接种狂犬疫苗,就像我儿子所做的一样,否则这个人将是一个毫无顾忌的爬山者和划桨人。

对于新增的潜意识的内容来说,文字出现前的人们还并不了解“市场投资”是怎么回事,他们能否想象得出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即假设人们拥有一些基数测定物比较价格并通过主观判断得失对可能产出的价值进行打折?效用最大化理性是否存在于市场之前并塑造了市场呢?是否市场环境建构了那种心理模式?

现在考虑一下“身份认同”,正像许多人所争论的那样,我们都有多种复杂的身份认同。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目的,对待风险的态度都可能支配我们从中选择什么作为侧重点,仅仅变为突现特征。所以世贸中心被摧毁后,作为美国人,我们加深了美国人身份的认同感。

沉默的认同也许能转移到亚国家层面上。南斯拉夫解体以前,一个人可能认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有人则可能强调自己对所属族群认同,但是

对所属族群过于认同则可能导致狭隘的小集团主义或者自我主义。

但是自我认同也可能是隐性的,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正如大卫·莱丁(David Laitin)告诉我们一样,当苏联解体时,许多讲俄语的人——并不都是大俄民族,被驱逐到俄国以外像波罗的海地区,同样被列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等,他们开始被认同为新的族群——“泛俄罗斯人”,强调拥有共同的俄语语系(莱特 Laitin, 1998)。虽然明确意识到其他认同已经是非常久远了,但是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类似地发现了白俄罗斯少量讲俄语的人(但更多的是乌克兰人,而不是俄罗斯人)新的身份认同。

德涅斯特人不是一个民族的事实并不是关键:认同感通常在民族冲突的考验中一次一次形成并重塑,并且很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团体的族群动员可能促进反对组织的产生和动员,反对组织的民族认同感可能随着武装冲突的结束而消失。(考夫曼 Kaufman, 2001, 130)

或者有人获知在英格兰孤立居住的少数民族拒绝承认是英国人,他们自称为“非洲加勒比人”或者“亚洲人”。但是欧盟的发展是否会形成不仅口头上所说的“欧洲人”,而且可能最终会使国家以及五国家的族群认同感消失呢?

现在同样讨论一下“目标”。甚至连理性选择的理论家有时也认为目标或多或少会受到行动者所处的境遇影响。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从企业管理的著作中认识到通常有一个“委托——代理”关系模式,也就是合理的目标并不是留给代理人去决断,而是由委托人事先规定好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CEO 期望公司利润最大化。将军期望他所指挥的部队伤亡人数与对敌人战斗力造成的伤害相比尽量小;学者则希望激发人的思维,正如我现在所努力做的一样。就像旧的社会角色理论所阐述的,特定环境最终决定某种目标的产生或排除。

然而,考虑到本书的主题,我认为寻找一个最大的或最重要的目标(通常称之为“行为的动机”)来构成所有民族冲突的基础是不理智的,因为特

殊的环境下在所有可能的目标间会有所侧重。因此,可能受修西德底斯(Thucydides)的启发,霍布斯(Hobbes)认为代理人通常都是追求“安全”、“收益”和“声誉”作为人生的主要目的,只是将“权力”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当前手段而已。

有人强调安全或者是对生命安全的考虑是最主要的动机。像在国际关系上相互仇视的两个国家一样,当国内的民族在寻找安全时缺乏公共权力,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当一个组织动员士兵或者为了防护准备更多武器时,对于另外一个组织来说则意味着潜在的威胁,恶性循环可能随之产生。(例如,哈丁 Hardin, 1995; 保罗森 Posen, 1993)。有些人可能害怕其他少数民族,因为担心来自那个民族可能发生的犯罪甚至是种族灭亡,这是正常的。2002年5月,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二轮选举中,18%的法国人把票投给了极端憎恨外国人的简·玛丽(Jean-Marie Le Pen)。他的理论重点在于推动纯正法国人的繁殖(即鼓励生育,禁止流产)并且不欢迎外族的移居(禁止移居,阻止他们工作)。表面上关注的是防止犯罪,其真正暗含的是对于不利的经济情形的担心,这也正是他所呼吁的中心。

有一些人可能强调收益或者经济竞争是中心要素,特别是当一个族群想从国家中分离寻求自治的斗争中,如果不能有更好的经济权利,往往这种斗争将会持续下去。(例如, Cook 库克, 2001; Cook 库克, 2002, 67-70 页; Horowitz 霍洛维茨, 1985; Woodward 伍德沃德, 1995)。通常民族歧视就来源于可感觉到的对某族群经济利益的威胁,就像前东德严重的高失业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排外感。但是并无证据表明,民族仇恨或者仇视暴力行动与区域或者个人的经济贫困有直接关系。这些暴力行为和冲突绝非总是存在于贫民区,也可能来自于经济地位处于任何水平的区域或者个人。

然而,正如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2001)所论述的一样,还有一些人可能将“名誉”或者民族地位视为民族仇恨的主要动因,往往非理性地把这些与充满感情的民族神话或民族象征紧密相连。考夫曼(Kaufman)被误导了从而低估了安全或经济的目标。代理人有时考虑到自身利

益而采取适得其反的行为,但同样也是对自身地位的追求。毫无疑问,尽管民族仇恨也与对安全或者经济地位的关心紧密相连,但是对自身地位的担忧是民族仇恨的常见因素。

迄今为止,我一直回避有关民族认同的正确理论的讨论(例如:斯坦克和科伯 Stack and Hebron,1999,33-45页)。“我的观点是多元主义的”:即也许并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理论,原因在于针对每一个具体的民族问题,没有理论对每一个民族问题都适用有效。当一个人在谈论一个民族为什么只爱自己的民族而对其他民族充满仇恨时也同样如此。在民族认同理论中共有三个流派,按照民族认同感的稳定性递减的原则可排序为:(1)原始的状态;(2)理性选择;(3)建设性。这三个流派分别强调的是(a)生理安全;(b)经济利益;(c)地位象征。虽然并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是九阶矩阵的理论模式和相关的目标重点在分析具体民族认同感的问题上是很有用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同感或者仇恨的基础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也可能破坏任何一个认同理论。因此当我们对生理安全 and 我们的经济地位有自信时,很多人可能会把重点转换到地位象征上去。

对自己的族群种族极为偏袒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个人动机。在民族冲突中大多数代理人,无论是其中的精英还是普通民众都有着混合的动机。而且各种动机的比重可能会随着不同情况而定,其中包含各种民族政策的诉求。但是动机归因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从来都不能直接观察到动机,最多只能从我们所观察到的内容中进行推测。其中一部分我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他们说了什么,但是,在一些问题上,真正的动机是不可能公开承认的,一些公开讲述的可能是虚假的,这是从个人私下与密友交谈中推测而来。或者我们是否应该看看代理人都在做些什么呢?通过有限理性的假设,动机可以从其转化而成的明显的行为中进行推测。观察真实的行为结果是没多大用处的,因为由于错误的判断,根本无法掌握真正的动机,也许代理人以追求安全或经济为目标,而结果却是使情况更糟。在其他情况中,获得预期的结果可能只是幸运的意外。在寻求民族冲突的解决方法时,在五、六、七章中将会进行专门阐述,我们又不得不回归到动机的复杂因素上来。

目前,我想指出的是不应该将个人心理规律视为简单的或一成不变的,而应该将其视为“复杂的并且不断变化的因素”。像其他系统一样,一个心理系统有许多部分,而且每个部分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部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同时各种变化也存在于各种联系中,从而使其更具有复杂性。

过去,我承认对危机、认同感或者目标的一些态度“限制”了当前的环境塑造。这些可能早在某些惊讶中认识到,并成为再学习的障碍,至少在那方面造成了缺陷。像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所论述的那样许多经历过大萧条时代的人,其余生在经济上都会极其小心谨慎,而不像那些在较好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孩子们(英格尔哈特 Inglehart, 1997, 1990)。当我写到此处时我发现目前的奇夫诺(Chicano)的成年人不仅不会说西班牙语,而且抵制学习西班牙语,因为当他们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严禁他们说任何西班牙语,而只希望他们掌握英语,以实现更好的融合。

在汉斯·加达默尔(Hans Gadamer)的圣经诠释学中,解释文章的艺术在于:他建议在部分与全文之间来来回回地往复,也许我们在解释人的某些行为时也应该类似地,将个人与所出的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然而不仅是思考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具有个人的心理权利,社会学通过更结构化的方法能够更具有牵引力。因为尽管社会系统很复杂,但是我们能通过较好的描述背景,从而理解有限理性的代理人所做出的策略选择的目的。除此之外,社会背景可以从形成人的心理状态的“贮藏库”中选择或者起着塑造作用。所以当我们在观察“春天的行动”时更应该关注代理人所处的环境形势,而不是关注似乎从环境中被割裂出来的个人。再一次指出的是,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不由自主自发的过程,或对新知识的抵制外,几乎没有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个人心理。

谈及动机时,有人可能会更积极地提到人的“希望”,但是我更想揭露“恐惧”的消极方面。对于恐惧我们似乎都不够了解,我们会发现有人对“恐怖能够影响到我们选择”的论述进行猛烈驳斥。在《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解释说:怎样认识在自然状